

“博古通今胸怀天下”第九届北师大时事知识竞赛  
总决赛举办

4月15日，由本科生工作处、教育部高校辅导员培训和研修基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主办，北京师范大学“形势与政策”小组承办的“博古通今胸怀天下”第九届北京师范大学时事知识竞赛总决赛在教九楼举办。北京市慈善协会常务副会长，原全国政协委员、民盟北京市委常务副主席、历史学院校友朱尔澄，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历史学院校友彭勇；我校校长助理（挂职）何伟全，党委宣传部、本科生工作处、辅导员培训和研修基地等职能部门负责同志和历史学院负责同志、专家学者、校友代表等出席活动。首都各高校学生团体代表和我校师生共400余人观看了比赛。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主播郭志坚作为特邀嘉宾莅临现场。

本届比赛历时近一个月，共有来自21个学部院系的35支代表队、105名选手报名参加。经过初赛选拔，历史学院、哲学学院、教育学部、法学院4支代表队晋级决赛。总决赛以2017年度时事知识盘点为主线，包括世界之旅、人物今昔、人物荟萃、人物探微、今日亚洲等环节。选手们通过必答题、抢答题、互选题等丰富多彩的形式角逐最后的冠军。

经过激烈的比赛，教育学部代表队获得冠军，法学院代表队获得二等奖，历史学院代表队与哲学学院代表队获得三等奖。

法学院、教育学部、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哲学学院获得“最佳组织奖”。

法学院本科生马宁和教育学部本科生朱彤获得“最佳风采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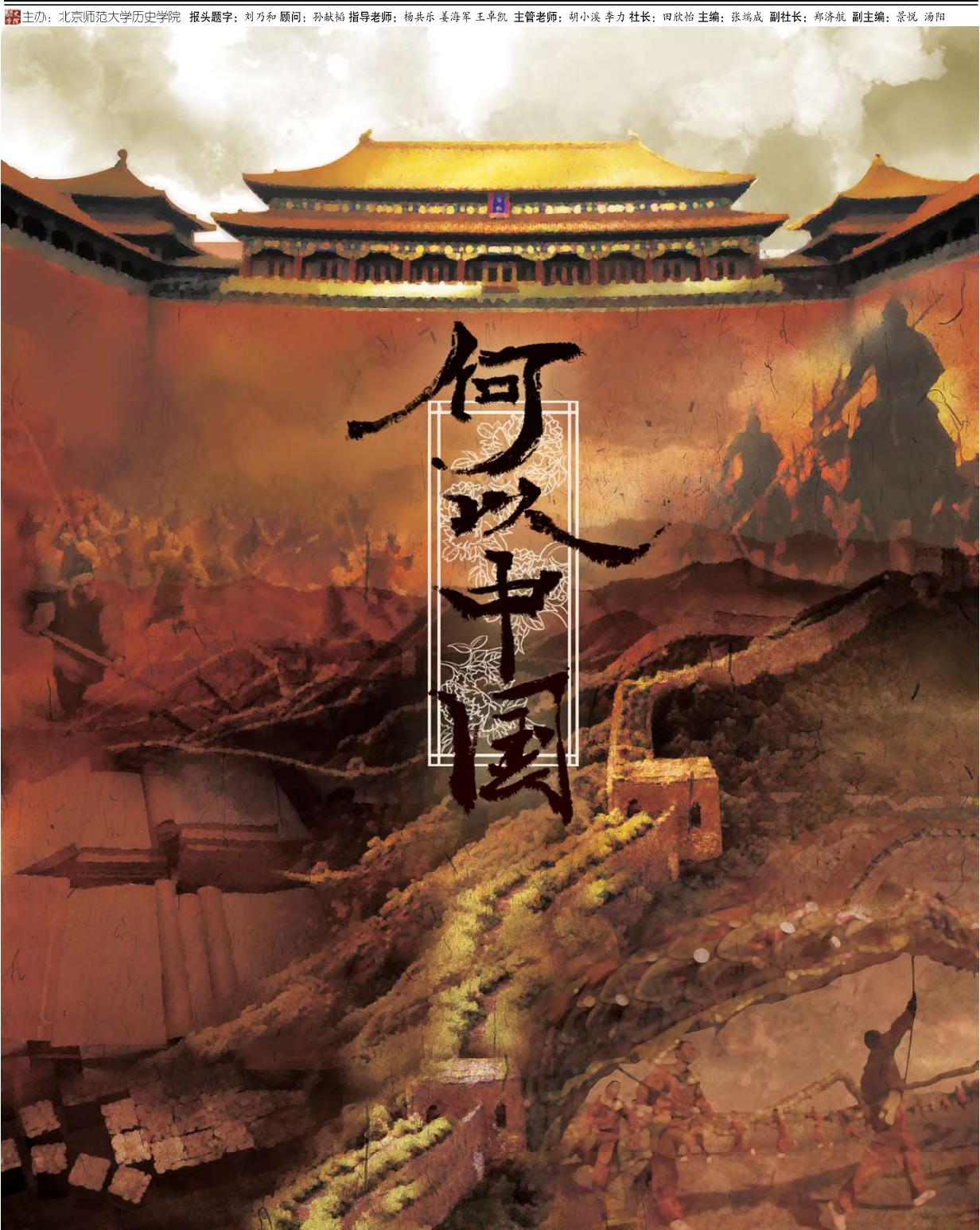
郭志坚对全场比赛进行点评。他表示本次比赛设计成熟、竞争激烈、互动性强，对师范大学子广博的知识、敏捷的思维、沉着的表现给予了肯定。他鼓励同学们在关注时事的同时要把握事件的来龙去脉，“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由此对时事产生进一步的思考。他欢迎对时事感兴趣的同学们未来能够从事外交和新闻工作，为伟大祖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力量。

此次比赛作为北京师范大学“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的实践环节，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为一体，并通过网络现场直播。比赛旨在激励同学们关心时事、开阔视野，培养青年学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和担当，成为北师大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创新的又一次成功实践。

# 春秋人文报



刊号：BNU-006  
2018.04.01 总第92期



本报招商电话  
13121141100  
联系人：田欣怡

历史学院



官方微博：北师大-春秋人文报  
微信公众号：chunqiu renwenbao  
工作邮箱：chunqiu renwen@163.com

# 欲将沉醉换悲凉：

## 郁达夫小说中的动荡与感伤

他生于明媚秀丽的富春江畔，却适逢一个动乱激荡的年代；他是天真浪漫的风流才子，也是气骨坚贞的革命烈士；他狂狷自负，却又敏感自卑；他襟怀坦荡，却遭人诟病。他集诸多矛盾于一身，不变的是他生命中那一抹感伤的底色，他便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

郁达夫名文，取“郁郁乎文哉”之意。郁达夫一生也确与文字结缘。郁达夫古典文学功底深厚，又饱受日本与西方文艺浸润，在多种文本上均有成就。其中，颇能体现郁达夫独特气质和情感忧郁的性格基调的文体之一便是小说。郁达夫的小说多书当世之事，于动荡之中见感伤。“踽踽独行于兵荒马乱的年代，狂狷于文字，浮浪于生活，零余于当世，这样的人，大抵和他笔下‘沉沦’的主人公一样，‘孤冷得可怜’。”（李乃清：《放棹江湖漂零客·郁达夫诞辰120周年》）

郁达夫的文学创作中自我意识强烈，小说中多带有浓厚的自叙体色彩。其中《沉沦》中刻画的那个孤冷可怖的留日学生，作为寄居异国的弱国子民饱受歧视和轻侮，又因他敏感孤冷的性情被中国同学所疏远。离家交游的他在遭受了爱情的失败和与长兄的决裂后在无限苦闷和忧愁下将茫茫的海作为了自己的葬身之地。除去小说的结局和夸大的成分，《沉沦》和郁达夫本人那段求学东洋的经历是何其相似，文中主人公那种孤独感伤的情绪也可以看作郁达夫本人在那一时期的情

绪的一种反映，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这篇小说就是郁达夫自身的写照。他无畏而坦率地暴露了他的感伤、他的苦痛甚至是在压抑中所产生的情感，也因此受到了卫道士们的大肆抨击。但这样的率直和真诚也是《沉沦》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沉沦》取材惊人，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它使作者受到道德先生的口诛笔伐外更以其清新的笔调和自我意识的觉醒唤醒了无数的青年。

郁达夫对于“日记文学”十分倡导，他曾作《日记文学》，其中写道：“日记文学，是文学里的一个核心，是正统文学以外的一个宝藏。”他的这一文学主张不止体现在他整理自己的日记并出版，也体现在对郁达夫其他文体诸如小说的影响上，在郁达夫所作的《日记文学》中还提到：“文学家的作品，多多少少总带有自传的色彩。”这一点

在其本人的作品上体现得也颇为明显，郁达夫的小说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可谓独具特色，个性鲜明，不以情节的曲折与人物的饱满吸引读者，却不吝惜笔墨描写主人公的心境和所处环境的种种景物，他塑造了众多内心苦闷、饱受社会摧残和虐待的人物形象，不止是从中可以看到他自己影子的客居异邦的留日学生、罹受贫穷和失业折磨的知识分子，还有《薄奠》中饱尝生活困苦的力车夫等。在《春风沉醉的晚上》中深受剥削和压榨的女工。在这些作品中，打动我们的不仅是郁达夫作为一个文学家动人的笔墨，更有其悲悯的情怀。在他的另一名作《茑萝行》中，他以第一人称叙述，天才地使用了茑萝这一意象比喻那些逆来顺受又深受夫权压迫的女性。这个意象不仅道出那些可怜可悲的女性只能依附于男子、受夫权凌驾的悲惨命运，也另有值得深思之处：在动荡的社会之中，小说中的“我”，那个家庭中凶恶的暴君也是一个懦弱的受难者，“我”所施加的种种虐待、侮辱也是主人公在社会上备受欺凌的一个折射，文中的女子

是只能依附于乔松的柔弱茑萝，文中的“我”却并非乔松，两人的命运在本质上是相似的，都身处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都是这动荡中无奈而无力的感伤者罢了。

郁达夫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不仅体现在他至今仍未成年的死亡，也体现在他生前遭受的种种议论。郁达夫生前诸多作

品受人非议，不止是《沉沦》这篇曾引起了巨大反响的代表作，他所创作的《茫茫夜》也受到了许多批评，其中不乏以道德的堕落为名的责备指摘，《她是一个弱女子》更是不止一次遭禁。不可否认，郁达夫的小说在具有极高的艺术性和感染力的同时，确有感伤消极的成分在，本文所述正如题目所言，谈及的多是郁达夫小说中的动荡与感伤，但若因此认为郁达夫只有感伤的一面，甚至给这位伟大的作家扣上颓废派、享乐主义者的帽子，未免太过片面。郁达夫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对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抱有十分殷切的希望，从其早期小说中就可看出郁达夫并非仅仅沉溺于自身的苦痛而自伤自怜，在其感伤中更有他对于社会和国家的忧虑。《沉沦》中主人公对贫弱祖国的呼

唤震耳发聩，他对故国的拳拳深情更令人感动，“那一颗摇摇不定的明星的底下，就是我的故国，也就是我的生地。我在那一颗星的底下，也曾送过十八个秋冬，我的乡土呵，我如今再也不能见你的面了。”（郁达夫：《沉沦》）

郁达夫貌唐忧郁的外表下，是一颗澄澈炽热的赤子之心。在国家遭受日寇铁蹄侵扰之时，郁达夫凭借其忠勇和无畏为抗日救亡奔走发声，创作了诸多富有战斗力的杂文，他在一首《满江红》中写道：“拔剑光寒倚天胆，拔云手指天心月。”他以笔为刃，直指那残暴的侵略者。郁达夫于1945年为敌寇



郁达夫  
忍杀害，至今不知埋骨何处。  
但我们永远铭记郁达夫作为一个爱国者的铮铮傲骨以及那清癯萧疏的身影下所蕴藏的一腔热血，斯人已去，忠骨长存。■

撰稿 / 本报记者 景悦



郁达夫的作品：沉沦

# 初虚初愤访多哀

相信不久之前，许多人的微博、微信朋友圈都是一条近乎不可思议的消息刷了屏：一个美国小伙因沉迷中国网络小说戒除了毒瘾。那么，网络小说究竟是何物，有如此神效，能跨过语言的障碍，让原本耽于毒品的美国小伙戒掉犹如附骨之疽的毒瘾呢？

在百度百科的定义中，网络小说是依托网络基础平台，由网络作家发表的小说。它是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兴小说类型。简单概括一下网络小说的基本情况：从发布平台来看，早期的网络小说平台有天鹰文学、幻剑书盟等，如今比较热门的网络小说平台有起点、晋江、连城、潇湘等等；从分类来看，网络小说可以粗略地分成玄幻、武侠、仙侠、言情、历史、同人等几类，再往细划分，每类小说下还有诸多分支，主题各不相同。

不同人眼中的网络小说也各有不同。关爱孩子的家长大多会义愤填膺地指责网络小说毒害孩子们的思想、浪费孩子

们的时间，可谓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但热爱阅读的学生则会说网络小说是他们闲暇时间的消遣，不可或缺的伙伴，甚至有人说，是网络小说鼓舞了他们，让他们继续奋斗下去的勇气和动力。可以说，前者将网络小说妖魔化，后者则将网络小说神化。

让我们丢开妖魔化或神化的视角，以一个公平客观的角度看去，网络小说究竟能带来什么。

在2014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80后网络作家周小平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特别关心，习总书记对他和另外一位网络小说作者说：“希望你们创作更多具有正能量的作品。”能够传播正能量的网络小说并非独此一家，当年明月的作品《明朝那些事儿》就是另外一个例子，他将史书上冰冷机械的事件演绎成活波的故事，让陌生又模糊的历史人物生动鲜活起来，受到了各年龄段读者的欢迎，成功激发了读者们对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兴趣。

那些以幻想为基础的光怪陆离的玄幻小说，就真的只会浪费读者们的时间，影响孩子们的学习吗？也不尽然。大部分网络小说的主角都具有传统英雄人物所拥有的一切美好品质，他们自立自强、正直勇敢、坚定执着、敢于迎难而上，让我们敬佩的同时唤起了理想的共鸣。拿红极一时的网络小说《完美世界》来说，男主角石昊就是一个传统的英雄角色，他的一生苦难重重，很多时候都是独自一人在拼死奋斗，可尽管他幼时受尽折磨却依旧善良淳朴，成年人后甘愿牺牲自己来保全大多数人，即使备受欺凌也从不放弃希望……这些情节

让许多人在潸然落泪的同时坚强起来，能够擦干眼泪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完美世界，里面住着理想中的自己，只要唤醒他，就能闪闪发光，网络小说，和他所塑造的完美主人公，就能潜移默化地让理想生根发芽。

但不可否认的是，如今的网络小说界，存在很多问题。

近年来，网络小说改编拍摄成电视剧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许多风靡一时的热播剧就是改编自网络小说。这些电视剧一经播出就大受欢迎，在暑期档收视率排行榜上居高不下。然而，这些改编成热播剧，让作者、演员、投资方等赚的盆满钵满的小说中，有一部分是其作者剽窃他人劳动成果的产物。毫不客气地说，这些涉嫌抄袭的作者，就是盗窃他人脑力成果的“小偷”，然而这些在网络世界偷东西的窃贼，不仅很难受到惩罚，即便被原创作者讨伐，还有无数打着“我才不管它是是不是抄的，反正我就喜欢看”口号的粉丝们百般维护。

抄袭现象的屡禁不止或许和部分网络小说作者急于求成、耽于名利有关，但也与网络小说本身情节单调有关。有人说，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充满了“套路”的时代，这句话是否正确还有待检验，但是必须承认的是，大部分网络小说都有一个固定的套路，玄幻小说崇尚“逆袭”，大多讲述一个平庸的少年是如何通过努力登上世界的巅峰的；言情小说里的男主角大多是梦中情人霸道总裁款，在男女主角迈向幸福明天的道路上，一定要有一个或多个恶毒女配跳出来阻挠他们……这

些老梗反复出现在一部又一部小说中，琼瑶言情小说中的套路还在一些言情小说中延续，有的读者甚至可以看开头就猜出结尾。情节相似不仅给读者带来审美疲劳，也混淆了“借梗”与抄袭的区别，让诉讼抄袭的案件难以决断。



完美世界

汉朝历史、颠覆历史既然是非黑白的问题，她在书中捏造汉朝侵略压迫西域的情节，抹黑汉朝反击匈奴的正义性，卫青、霍去病这两个民族英雄在她笔下成了目光狭隘、跑墙内斗的小人。她编造的如此离奇的情节竟被许多读者当成历史事实，甚至有过激读者跑去卫青墓前以示敬仰为泄愤。可即便如此，《大漠谣》还是被粉刷一番改名《风中奇缘》播出，继续造成不良影响。

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不容忽视：网络小说成了一些错误思想、违法内容传播的途径，尽管国家多次展开行动净化网络环境，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很多不法分子仍在抓住网络漏洞，以网络小说为媒介，传播淫秽色情内容，甚至是宣传毒品、反动思想等等。同时一些网络小说性别观落后，将小说中的女性角色作为男性的附属物。这样的问题一日不改善，网络小说就难以彻底被公众接受。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网络小说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结合体，它既受人诟病，又有人推崇；既茁壮成长，又伤痕累累；既沐浴着金色的阳光，又在身后投下漆黑的影子。我们不能说网络小说是有害的或是有益的。喜欢网络小说的人，在享受着网络小说带来的欢愉时也要警惕它潜在的危害；不喜欢网络小说的人也不必时刻将反对挂在嘴边，只要维持对原创的尊敬便已足够。我相信，有朝一日，网络小说终能真正走进文学的视野、登上文学的殿堂。■

## 网络小说现状考察

### 光影同存



明朝那些事儿

春华灼灼 秋实硕硕  
撰稿 / 本报记者 王浩琳  
(图片均来自互联网)

春华灼灼 秋实硕硕



# 返校宣讲: 寒冬中的“薪火相传”

【北京师范大学】同学您好，欢迎参与优秀学子回母校宣传活动，您的培训场次为12月27日12:20教九502，请提前十分钟到场、签到，并领取相关材料，收到请回复。”分散在校园各个角落的手机不约而同地“滴滴”响了起来。

2017年年末正值忙碌的考试周，不少同学都收到了来自教务处通知返校宣传培训会的短信，复习得焦头烂额的学生们，心里开始升起一丝小小的期待——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假期里，自己将以学长或学姐的身份回到高中母校，为高三

学生介绍大学并传授学习经验。

“我们学校历来都有这样的传统，毕业生回母校宣传大学，为高三的学弟学妹分享学习经验，我今年是第一次回去，挺紧张也挺激动的。”历史学院17级的新生申金女分享了她即将回到母校的心情，“但这是第一次组织大型的宣讲会，也有不小的压力。”这大概是所有返校学子共同的心情，特别是刚刚度过了九一第一学期的新生们，要把宣讲活动办好，兴奋同时也背负着不小的重任和压力。

转眼进入了假期，学生们陆续回到了家乡，开始着手准备起自己的宣讲活动。一次完整的宣讲包括宣讲前的准备、宣讲中的发挥、宣讲后的整理三个部分，每个环节都需要团队齐心协力的配合。历史学院的蔡平此次代表北师大与华东师范大学联合，她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团队里小伙伴们一起全力以赴地去做这件事，大家都各出心裁，尽力将宣讲成果做到最好。很高兴我们做的海报在今天晚上还被新华社的官微点名表扬了。”

宣讲前的准备工作是否完善，直接决定了宣讲的效果是否理想，广告宣传、设备检查、宣传物资等等都缺一不可。蔡平向我们展示了她们的前期工作，在“在宣讲活动进行的前期，我们从各个渠道进行了宣传。首先，我们制作了一个风格活泼、贴近高中生心理的宣传视频，通过QQ空间转发扩散，进行一次宣传。在一次宣传中，说说转发量达到104次，视频播放量突破1万。接着，我们制作了八张色彩明丽、具有吸引力的校园美景宣传图，通过QQ空间转发扩散，进行二次宣传；二次宣传转发量达到38次。然后，我们七人还通过逐班走访，通知本届高三共



返校宣传现场

20个班级次日中午宣讲的时间与地点，进行三次宣传；在三次宣传中，不少高中学生都对我们的宣讲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除此之外，我们制作了三张明快醒目的宣传海报，于校园各处进行张贴。”基本上是全面俱到，无遗漏。

报名北师大宣讲培训会的同学，都需要在宣讲结束后向招办老师发送活动反馈，而即使没有学校要求，不少同学也自行做了对宣讲活动的总结。面对记者，历史学院的王茹琰回忆起她宣讲过程中的难忘之处：ppt放映突然出现了问题，

全场气氛尴尬时，她镇定地上前向听众们解答一些问题，比如“来了北师大一定要当老师吗？”，几分钟后设备恢复正常，全程衔接自然，宣讲得以顺利进行。“结束后，有个家长夸我‘口才真好！’”王茹琰有些害羞地说。

在采访过程中，王茹琰也对这次活动中遇到的困难进行了小小的吐槽。由于宣传物资严重缺少，成员们只能自己凑钱，自费买一些纪念品发送给对北师大感兴趣的学弟学妹。对比其他学校官方支持的宣传海报、报考指南、明信片、书

签等物资，我校提供的几份报考指南和宣传单页对于百余人的宣讲活动可以说是杯水车薪，我校在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待加强。

宣讲活动的进行，都使两方学生受益良多。一方面，通过高考生经验和大学相关信息的分享，使高三学生能够对大学的选择构建初步的理想框架，提早进行升学规划；另一方面，刚刚入校不久的大学生们也因此提高了自己的组织能力和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从活动中吸取的经验对个人成长有很大帮助。历史学院的郑家祥向记者分享了自己的收获：“这次回母校宣讲收获良多，既提高了自己的沟通交流能力，也锻炼了自己的胆量，丰富了自己的社会实践经验。”王茹琰也不禁感叹：“唯有亲身体验，才知道什么叫艰难和成就感。”

一次普普通通的宣讲活动，像是寒冬中的薪火相传，火光中映照着历届学子对母校深沉的信赖，见证着每个人的蜕变成长。■

撰稿 / 本报记者 陈嘉琪  
胡艳月  
图片来源 / 蔡平 陈嘉琪



蔡平在宣讲中

# 沈雪晨：生活在别处，别处也一样



沈雪晨

同样适用于他所创作的歌曲。

他在《小巷》的歌词中这样写道：“河边的那条小船，一直都没人去管，年轻人用它去城里要很久。”这段话颇有木心《从前慢》的影子：“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都慢。”沈雪晨素来喜欢内心的文学，他们一个来自南浔，一个来自乌镇。江南小镇的梦想，一定留在了他们各自心里的最深处。

从南浔的小巷走出，要很远的路。但对于沈雪晨来说，或许已习惯了远行和归家的周折。本科就读于兰州大学的他，研究生阶段还在台湾交换了一年。常年的走南闯北，让他总是以一个异乡人的身份面对周遭的环境。

从南浔的小巷走出，要很远的路。但对于沈雪晨来说，或许已习惯了远行和归家的周折。本科就读于兰州大学的他，研究生阶段还在台湾交换了一年。常年的走南闯北，让他总是以一个异乡人的身份面对周遭的环境。

雨一直下到了深夜  
明天醒来我会在哪里  
沉默是公馆的街  
成长就是去体会异乡的感觉  
——《雨一直下到了深夜》

然而，沈雪晨的身上似乎很少见羁旅的愁思。在被问及生活上的不适应时，他也轻描淡写：“第一年到兰州的时候

当然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是那都是小事啦，而且接触一个陌生的环境也挺好的。毕竟从小到大都被所处的环境制约，到了北方，一个人都不认识，反而可以试着换一种方式重新生活。”

试着重新生活的沈雪晨，在大学阶段做了一些看似与实际利益无关的事情，用他自己的话说，即做了一些“理念性”的事情。组建“向日葵乐队”或许就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件。当初组建乐队，只是为了唱和几位喜欢音乐的同学一起唱歌，但当今年年初，他们终于登上了“中国队”的舞台，获得万众瞩目的荣耀之时，沈雪晨认识到他们“离梦想近了一步”。

本科毕业后，“向日葵乐队”的成员重又散向天涯海角，开始新一段的旅程。沈雪晨在研究生期间，赴台湾大学参加交流项目。台湾的生活经历，让他重新站到了一个“他者”的视角来观察世界。作为“陆生”的他应当怎么对待这段经历？台湾的民众又是怎么看待大陆的？他常常思考这些问题，也凭借《莫忘趁行庆》一文获得了第六届两岸征文奖大陆地区的首奖。

在外面待久了，再回浙江时，沈雪晨在对待自己的故乡时也会保持一点距离。可见生活在别处的经历形成了他独特的视角，“它可以让你和发生的事情保持一定的距离，能更冷静地看到一些本质性的东西，不会被一些表象困扰。”

学术与创作：在烂醉的台北街头遇到伯夷叔齐

沈雪晨的专业是历史学，音乐创作对于学术来说，也是某种程度上的“他者”。不过，



向日葵乐队

他习惯于将自己学习生活中的一些思考融入创作中。台北街头，沈雪晨和好友陈瓣喝得烂醉，讨论着伯夷、叔齐；读杨牧的《喇嘛转世》，有所感触，为之谱曲；鲍照的《春日行》，被向日葵乐队改编成《待春日行》并加以吟唱。对于这些歌曲的创作思路，沈雪晨这样说道：“如果我不是历史专业的，当然不会有这么感觉。”

我在凌晨烂醉的台北街头  
遇到了伯夷和叔齐  
他们手上拿着阳山上的蕨类  
和一手冰凉的啤酒  
——《伯夷叔齐歌》

但是沈雪晨的学科背景在团队中并不会时时清明。相反，正如他所说：“大家都看不出来我是一个历史学的，因为直接的知识很难和外界交流，但是从历史上得到的观念是终身的。比如重视永恒的价值，处理事情比较温和，尽量保持冷静的态度，从长时段考虑问题等。”

或许是因为习惯了抽离的视角，沈雪晨将生活与音乐也处理得若即若离。《妈妈，你不要再对我生气啦》是向日葵乐队一首流传较广的歌。网易云音乐中有评论一度以为这首歌反映的是乐队某位成员的家庭，然而沈雪晨澄清道：“这个‘妈妈’不是我母亲，这只是我与另一位女生聊天的过程中获得的想法。”《我会悄悄离开北师大》

是沈雪晨研究生一年级时写的一首歌，那时他刚踏入北师大校园，设想了一下毕业会遇到的问题，便作成词曲。“世界包含的内容是丰富辽阔的，音乐能承载的内容也不仅仅是自己的生活而已。读书、交谈的过程都能够成为创作的素材。”他希望自己的音乐能够在更广阔的世界中扎根。

洋槐花接时开了吗  
春坛路何时入了夏  
寄完最后一个包裹  
还能把你带回家  
——《我会悄悄离开北师大》

不过转而，沈雪晨也强调音乐与生活并非完全对立，“音乐固然可以成为日常生活的补充，但绝不是因为对生活不满，或者消极避世才做音乐”。沈雪晨忠于音乐，但同时他更希望将音乐纳入到更宏大的生命体系中。他说：“无论是写歌还是写文，都是自己向永恒真理迈进步伐的时候。”

采访最后，当被问及什么是最向日葵乐队最核心的个性时，他提到了“温暖”一词：“大概就是温暖阳光的状态吧，我们一直在往这个方向发展。在外面生活遇到的艰辛的事情太多了，这么多人在奔波劳碌，能够温暖人心就很够了。”正如历史学的温暖来自于多维度下对所在时代的体认，沈雪晨的温暖也来自于不同方式下对个人生命状态的关切。旅居于天南海北的经历使他看问题的视角有所抽离，而穿梭于艺术与学术的生活又让他得以熔铸差异。时时刻自己“生活在别处”或许是沈雪晨充满温暖光辉的最大秘诀。■

撰稿 / 本报记者 张端成  
图片来源 / 沈雪晨

## 故乡与他乡：从小巷这边到另一边，有很远的路

初见沈雪晨，便捕捉到了他软糯的吴语口音。离家那么多年，乡音还是在他身上打上了“江南”的烙印。当然，江南小镇温润而不极端的特点，



沈雪晨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 多元视角？民族分裂？ ——“新清史”研究之争



罗友枝和何炳棣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当西方史学界渐渐接纳了中国史研究中常见的“汉族中心”的思想时，一种新的学术思想却在遥远的美洲大陆悄然勃兴。在论辩与争鸣中，“新清史”——一种迥异于传统清史研究观点的“新趋势”走上了舞台，在世界引起了震动和反响。作为一种异于往常的思路，“新清史”的诞生并不顺利，而它对传统历史研究思想的大胆挑战，也注定它的发展将时刻与争议相伴。

## 何谓“新清史”？

“新清史”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美国逐渐兴起的一种清代历史研究新趋势，是在冷战逐渐结束，世界族群冲突渐趋凸显的情况下，一些“新文化史”学者在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思想影响下提出的。（《美国“新清史”的来龙去脉》）不同于以往以汉族为中心的研究思路，“新清史”更强调满族自身的族群认同和社会特性，刻意淡化甚至反对“满族汉化”的观点，将清王朝置于当时整个内陆亚洲的环境中，视其为一个超越了“中国”的多民族帝国，并尤其注重其与边地民族的联系。新清史研究者

们更倾向于学习汉族以外其他民族的语言，利用非汉语著成的原始文献来研究和讲述清代统治下的社会万象。比较著名的代表有美国匹兹堡大学中国史教授罗友枝和哈佛大学东亚史教授欧立德。前者与何炳棣先生关于清朝统治因素的辩论掀开了“新清史”研究的大幕；后者则活跃在中美史学界之间，对“新清史”进行发展和解释性阐述。

严格意义上讲，“新清史”并不是与过去迥乎不同的全新事物，其更多的是一种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文化环境下形成的清史研究的新视角、新观点，只是方向上与传统习惯有较大差异罢了。但也正是这种差异，以及长期以来不同文化环境产生的不同影响，使得“新清史”的发展饱受争议。

## 争议在何处？

总的来说，关于“新清史”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中美学者之间，而争议的焦点在于“满族汉化”和“国家属性”的问题。

首先是“满族汉化”的问题，实质是中美学者在族群认同上的不同认知形成的矛盾。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文明”在历史发展中长期相对周边民族居于领先地位，加上鲜卑、女真、契丹等少数民族为了巩固统治也往往大量吸纳效仿汉族体制，逐渐形成了“汉族中心”的思想，并长期支配着中国的文化研究。然而“新清史”学者们却反对满族汉化的观点，相反他们认为清政府稳固

统治的成功因素在于其对自身族群特性和认同的保持。如“八旗制度”便是对满族人早期狩猎生活形成的独特社会结构的保留和延展。而在近代仍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反满主张似乎也佐证了“满汉分殊”的观点。“新清史”主张打破“汉族中心”的思维框架，发掘“非汉因素”，尤其是清王朝在处理边地民族事务时往往采用因俗而治的方法，大量吸纳当地民族文化，这也使得清朝的文化构成日趋多元，而非简单的“以汉为中心”。关于“新清史”的争论也由此激烈展开，最著名的莫过于罗友枝与何炳棣的论辩，前者认为清朝统治者采用如“国语骑射”这样更具满洲特性的统治方式和与亚洲内陆非汉族之间的文化联系进行统治（罗友枝：《再观清代：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质疑何炳棣的“汉化”说法，而何炳棣则认为罗友枝在“汉化和满族与非汉族关系之间构建了一个错误的二分法”（何炳棣：《捍卫汉化：驳斥罗友枝的〈再观清代〉》）。以二人为中心，一系列论辩逐渐展开。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愈加复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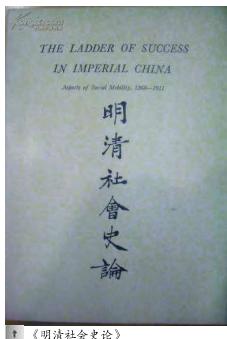
其次是国家属性问题。国内史学界通常将活动在中国广义疆域内的民族视作一个整体即中华民族，而作为中华民族一部分的满族建立的清王朝自然是中华文明（或者用西方的话说叫“中华帝国”）漫长发展史中的一部分。但“新清史”学者们认为，清王朝是一个包括了满、汉、蒙古、藏等众多民族的多民族帝国，其

意义已经大大超越了传统的中华文明，是一个超越了“中国”的帝国。因而他们更倾向于用内陆亚洲的视角去看“清帝国”而非用中华民族的视角去研究“清王朝”，甚至更进一步提出中华民族只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收复疆域”实际是“侵略扩张”。这种说法不仅是对国内传统历史认知的冲击，某种意义上更是对“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绵延无断绝”说法的挑战。这些有悖于国内外学者和民众共识的观点一时间激起了众多反对的声音。中国社会科学报就发文批评“新清史”的一些观点“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不被中国主流学术界所接受”（《美国“新清史”的来龙去脉》）。

从这个角度看，所谓“国家属性”问题本质上是民族认同问题的进一步延伸：认同“满族化”即承认了满族对于汉族文化和特性的认同，结合契丹鲜卑等例子进一步可阐发为少数民族对于汉族文化的认同。而这种认同使各民族之间构建起一种无形的纽带和框架，连结而形成了“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共同体。而“新清史”学者们则是从“满汉分殊”的角度出发去淡化“汉化”的影响乃至存在，并质疑“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的真实性，进而自然会有类似于“清帝国”不是“中国”的观点出现。又或者，这种理解本就是一种误读？

## “天使”还是“魔鬼”？

对于西方史学家们来说，“新清史”开启了一扇研究清代历史的新大门。但在中国学者的眼中，



《明清社会史论》



**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  
本书引何尊铭文“宅兹中国”为题，借助“宅”字定居与墨守的双重意味，引出运用现代历史学术研究理论，中国学人如何既恪守中国立场，又超越中国局限，在世界或亚洲背景重建有关中国历史论述的思考，为讨论国家疆域、历史认知冲突等问题提供参考。面对诸如“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等近来流行的历史学界关于“中国”的种种论述，作者既肯定其多点透视的新视角价值，亦考量到其局限性，从而提出“从中国历史脉络中理解中国”、“关注区域研究及亚洲整体背景下中国不可淡化的同一性”等观点。作者还从学术史的角度，为当代中国文史研究之路提出慧识，强调运用周边视角看中国的国际视野，聚焦中国史的中国立场，体察中国以及周边各个文明体间的交错文化史，以期从中挖掘新资料，形成新方法，研求时代学术潮流，颇具启发性。



**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当我们在一张纸上画一个圆形时，事实上是它的边缘让它看起来像个圆形。”对于“中国人何以是中国人”的问题，作者另辟蹊径，将关注点从族群核心和历史溯源转向族群边缘，以一个处于华夏边缘的台湾历史学家的独到视角，从社会记忆的角度重新思考传统历史文献，借考古资料探索人类生态变迁与相关的资源竞争，探究研究者自身族群认同观念对研究客观性的影响，分析社会人类学对族群现象的理论探讨，提出“民族史边缘研究理论”，由华夏边缘的角度，对“为何我们要宣称我们是谁”的问题进行解答。本书唤起读者对华夏边缘人群的关注与重视，引导人们关注华夏与其边缘人群的历史记忆的产生背景，解决历史争端背后的认同争端，也为两岸今后的资源分配、国际交流、世界资源开发与分享等提供了发展思路。



**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  
本书以“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为中心论题，结合清末至抗战时期整个中国特有的民族格局和历史处境，探析了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及其符号认同从酝酿、确立到传播、深化、社会化普及的过程，并深入阐释了中国近代的民族问题、民族主义、民族关系等相关思想观念。作者还就相关的热点问题展开历史考察，如关于“民族英雄”的认知与讨论，“中华民族复兴”论的兴起和流行等。此外，本书注重新方法、新视角的运用，将传统的精英思想史和“新文化史”有关方法相结合，注重政治学与人类学、东方与西方、历史与现实、各党派思潮等之间的复杂互动，论述丰满，语境鲜活，脉络清晰。同时，作者还关注到以往研究者忽略的方向，提出不少亟待重视和深入研究的问题。无论是对于读者深入理解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及有关思想，还是对拓展这一论题的研究，本书均能有所助益。

# 參考書目推荐



阿拉伯人藉由骆驼认识了中国

化与政治的概念。

“中国”应该首先是地理、文化和政治概念。民国初，章炳麟撰写《中华民国解》，关于中国名称说：“中国之名，别于四夷而为言。”又说：“诸华之名，因其民族初至地方而为言。……东北至于华阳而止，就以华定界限，名其国土曰华。……建汉名以为族，而邦国之义斯在，建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此。‘中华民国’所以道也。”（章炳麟《中华民国图解》）所以中国人对于中国的概念有一条很清晰的主线，从汉朝开始，人们就把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称作“中国”。中国一词，有着彰显正统的意味。在南北朝时，南朝自称“中国”，而把北朝称作“魏虏”，北朝自称“中国”，而把南朝称为“夷虏”。需要明晰的是，在异域文化中，“中国”是一个如何的概念，古时我国周边的邻国是如何看待“中国”这个概念的，以及对于我国的中原王朝有着怎样的地理、文

化与政治的概念。

在起初，异域文化并没有“中国”一词，它们自己语言中的“中国”，可以是对自己的自称，例如在印度，“中国”一词原本是指恒河中游的地带，古称为拘罗国土，是婆罗门文明的中心地，婆罗门教于此地建立。更多的是称我国的中原王朝为“支那”或者“至那”。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和我们发生接触、文化交流最频繁、文献记载保留最多的国家，莫过于印度。古梵文中的“cina”一词，是已知的最早的外国人对中国的称呼，一般音译为“至那”或者“支那”，这一词常见于汉译佛经中。除了佛经以外，《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摩奴法论》以及《利论》也对中国有所记载。这些文献的成书年代应该为公元前4世纪至3世纪。应当注意的是，在古代，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接触、交流是依地域的远近、时代的

# 異域文化中的“中國”

先后而由近及远，由少渐多，由模糊的传闻而逐渐成为比较详实的知识的。比如“cina”一名，一般来讲指的就是中国，但在古梵文文献中使用的这一名词的上下文来看，有时可能只是指今天中国西北的某一地区；在《罗摩衍那》，除了“cina”以外，还有“Paramacina”，意为“更远”或者“极东”的支那。追寻原因，应该是中国北方的邻国对中国了解，最初都是通过中国边境的少数民族或者部族。因此在古印度，“中国”这个概念在某些情况下又特指“西北边境的中国”或者“中国的西北境地”。

后来，在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一书中，记载了他与戒日王的对话：“王曰：‘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亘，去斯远近？’对曰：‘挡在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至那是也。’‘摩诃’是‘大’的意思。摩诃至那就是大至那的意思。这段对话亦可反映出在印度人眼中，“摩诃至那”已是中国中原王朝的代称。另外，唐代僧人道宣在《景德方志》里叙述了他对“至那国”的描述：“雪山以东，至于东海，名主也……是至那国，即古所謂振旦国也。”可能佛教僧侣对地理的概念还比较模糊，因此他们对于“至那”的了解也是“雪山以东，至于东海”。需要注意的是，起初“至

那”一词特指唐王朝，在沙门法云编的《翻译名义集》卷七“诸国篇”中有“脂那”一条，注曰：“一云支那，此云文物国，即赞美次方是衣冠文物之地也……《西域记》云，摩诃至那，此曰大唐。”另一名僧俗义净和尚也认为“且如西土名大唐为支那者，只是取名，更无别义。”

同样的，俄罗斯民族对“中国”的认知也符合这种现象。俄罗斯民族的形成比较晚，他们的祖先是9至13世纪形成的古罗斯部族。公元13世纪，蒙古人征服了古罗斯地区，并统治该地长达240年之久。在与蒙古征服者斗争和建立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的过程中，古罗斯逐步分化为三个民族，俄罗斯民族逐渐形成。俄语称中国为“Китай”，读音与“契丹”的古音非常相近。俄罗斯人最早所说的中国其实是指契丹。契丹在中国北方建立了辽，后来，契丹人又有一支西迁至中亚，建立了西辽。“契丹”这个称呼因而从中亚传到俄罗斯及东欧一带，因此“契丹”一名扩大而指整个中国。也正是这些原因，今天仍有十几个国家将中国称为“契丹”：斯拉夫语国家（俄罗斯、波兰、保加利亚等）称中国为“Khantia”；突厥语国家（中亚各国）称中国为“Kaitay, Kathay, Khatay”；西亚国家（伊朗、阿富汗）称中国为“Kaitay, Kathay, Khatay”。

汗、伊拉克等）称中国为“Kata, Khatay”。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中亚西亚各地与中国

的贸易大多通过契丹民族转手。

另外，在中世纪时，拜占庭的历史学家曾把中国称为“Taygas”。伊斯兰的文献著作则写作“Tamghaj, Tonghai, 或者 Tohgaj”。学界一般认为这是“唐家”一词的对音，而另外一种说法认为它们应该源字公元4世纪至6世纪在中国北方建立政权的鲜卑拓跋氏贵族的“拓跋”一名，这一名称在8世纪哥萨尔浑的突厥碑铭中就已经出现。随着突厥部落的西迁，“拓跋”一词也传播到中亚，然后被阿拉伯伊斯兰作家采用，流传于西方。他们对于中国的概

念也仅仅局限在遥远的东方国度，对于中国的地理状况并没有深入的认识。

异域文化中对于“中国”或者“支那”的认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以印度僧人眼中的中国为例，在魏晋南北朝时，将中国历届为喜马拉雅山脉以东直至东海的广阔地理空间，而后来唐代僧人在翻译佛经时就将其具体到李唐王朝。最终“支那”成为一个超越时空的概念，指所有的中原王朝。即便在今天，异域文化中的“中国”也在不断的变化。用王安石的话来说：“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撰稿 / 本报记者 李传奇



古印度婆罗门



滇王之印

1956年发现的晋宁石寨山第六号墓葬中出土了一枚金质的“滇王之印”，经过验证，这与《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相符：“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滇西南夷，举国降，置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印，复长其民。”这让我们不由得生起了探究之心，西南地区民族众多，其中“靡莫之属以什，滇最大”，滇国作为西南地区的庞大，在汉武帝的一统大业中，在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到底起了怎样的作用呢？当我们追溯历史，就会发现，“滇王之印”并不代表着这个民族的独立，而是恰恰反映了滇国在历史的洪流中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大一统”的进程中。本文将聚焦于滇国，来反映西南夷地区融入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程。

夷夏交融的前提是通路，可以肯定的是，滇国在战国时期与外界是有一定联系的，《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对庄蹻入滇有这样一段记载：“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证实了有水路可以通向西南夷地区。而且也有商路通往外界，以满足各地互通有无的需要。

随着秦汉时期专制主义中

往较亲近的一些民族受到利诱，归附汉朝。而此时滇国由于距离较远，对汉朝的情况不是很了解，甚至会发出“汉孰与我大”的疑问。汉朝在征服了滇国周边一系列小国后，以兵临滇，滇国举国投降，赐封滇王，允许滇王仍然统治本族，设置犍、牂牁、越巂、沈黎、汶山、武都、益州共七郡。至此，在西南夷地区初步建立起西汉王朝的郡县行政体系，将西南夷地区正式纳入西汉王朝版图。

从疆域来考察，滇国逐步纳入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版图中，从民族融合来看，滇国和华夏相互也产生了认同感。一方面，以滇王为代表的部分西南夷首先归附的形式，通过获得两汉王朝的封爵名号，成为两汉王朝统治西南夷的重要支柱，两汉王朝通过他们对西南夷实现羁縻统治。另一方面，汉武帝设置西南夷七郡之后，逐渐形成了汉族大姓，“自秦、汉以降不断进入西南地区的汉族官吏、商人和移民中分化出来的统治阶级，大姓是汉族移民且为移民中的统治阶级。”（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两汉之际，西南夷大姓势力初步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公孙述割据巴蜀，祥崩郡大姓龙、傅、尹、董氏等汉族大姓拒不降附公孙述，遣使绕道向东汉王朝表示归诚。这一事件显示，作为汉族移民后裔的西南夷汉族大姓，保持着对中原王朝的政治认同。他们在两汉王朝维系和巩固西南夷统治中，具有独特的作用。

到了东晋时期，《华阳国志·南中篇》在篇首特别注明“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其中的夷是指氐羌系的族类而言，越则是指濮越系的族类而言。这表明，蜀汉两晋时期已不再把西南夷作为一个广大地域内非汉族民族的整体加以看待了。（段渝《先秦汉晋西南夷内涵及其时空演变》）

同时，在经济方面，滇国

与中央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汉朝对西南夷农业有所提携，汉朝对西南夷的农业开发主要集中在夜郎、滇、邛都这些适宜进行农业生产而其在汉族政权进入之前农业已经有了初步开发的地区。西南夷地区出土的西汉后期的铁制农具在数量与种类上明显增多，这一现象与设置郡县后，巴蜀铁器流入西南夷地区的渠道畅通了有关，大大促进了农业开发；汉政府还委派地方官吏在西南夷地区推广水利灌溉，改变了过去那种完全由天象决定收成好坏的情况，使稳定的农业生产成为可能。

汉朝也需要利用西南地区的商路——“南方丝绸之路”，它是通过我国西南的四川、云南来连接缅甸、印度等国的一条国际交通路线，“南方丝绸之路”在汉王朝版图内的相当多的地段，一度演变为官营、官管的国家交通路线。东汉时期，

这条国际交通线上的活动，颇见于记载，此略。在考古资料方面，大量外来品如某些琉璃品、琥珀、水晶、铜虫（海贝）、翡翠、宝石、钻石、珍珠，在云、贵、川这一时期的墓葬、遗址中都有普遍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条路线上流通货物的种类和性质：主要是高级奢侈品。这是由长途贩运必然追求高利润的特征决定的。（罗开玉《汉武帝开发西南夷与“南方丝绸之路”》）

经过秦汉时期对西南夷地区的经营，我们可以看到，在疆域上西南夷地区归属于汉族政府；在政府的经营统治下，夷夏观念在减弱，西南夷地区的认同感逐渐增强；同时，西南夷地区与内地的经济联系也在加强。最终西南夷地区成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

撰稿 / 本报记者 王雨璇



古滇国铜贮贝器

# 滇國興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



# 故土与异乡之间：莫理循眼中的近代中国

走在商业气息浓厚的王府井大街，或许很难想象繁华街道昔日的模样。正是在今日百货大楼位置的西侧，曾有位对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影响颇深的澳大利亚人居住二十余年。

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澳大利亚人，大英帝国臣民，活跃于 20 世纪前后的北京政坛与西方新闻界，是位对民情内政均颇有见地的“中国通”。莫理循凭借好评如潮的《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一书被《泰晤士报》聘为驻北京特派记者；后又受袁世凯之邀成为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他自 1887 年 3 月到达北京后开始长达二十余年的中国生涯，对时局发挥微妙又重大的作用，在北京洋人圈内地位举足轻重。当时的人力车夫习惯性地将火车站旁的洋人径直拉向莫理循的住处，他们认为洋人来到北京，就一定要去拜见莫理循；而王府井大街也挂上了英文路牌“Morrison Street”。

1898 年 10 月 12 日，莫理循致信约·奥·珀·濮兰德（John Ottway Percy Bland），对中国局势进行分析。彼时莫理循任《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濮兰德则为驻上海记者，速达灭的戊戌变法已覆灭半月有余，而变法引发的波澜尚未平息。从这封信件中，或可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状况与莫理循个人所持立场窥一斑。

莫理循在信中发问：在这个国家进行一次和平革命是否可能？“官僚阶层是腐败的，但民众也是如此。从最底层到最高层，都是腐败的。”（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

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卷）莫理循得出这一结论不足为奇。早在其初次游历中国时，就曾眼见颁布禁烟法令的场景——吸食鸦片的地方官员将法令张贴在自己的罂粟种植附近，而法令又由吸食鸦片者起草、签署，甚至他们自己的俸禄就来自罂粟。普罗大众乃至相当一部分官员对于中国社会的把握远不如莫理循这样漂洋过海而至的洋人，维新运动的失败与此不无关系。莫理循所毫不怀疑的维新人士、孙中山和日本人三方的接触，于中国大众而言却是遥远和陌生的，由于人们缺乏对局势较为清晰的认识，改革措施要见诸行动而不引起叛乱实在困难重重。显然，中国将何去何从与大英帝国的利益有着诸多联系，而莫理循作为大英帝国忠诚的臣民，虽然对处境尚未有所改善的千百万大众颇为关注，但仍将大英帝国的地位置于核心。大英帝国是否将干涉中国内政，通过何种方式干涉，这种干涉会对双方产生怎样的影响，均成为当局政府和驻中国记者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此外，对于废除科举制的改革举措，莫理循也有自己的看法。在他眼中几万经受无穷苦难的“可怜虫”若失去怀牒自进的机会而得不到任何补偿，势必会投向改革者的对立阵营，况且维新派本就是相对弱小的新生产力。这与濮兰德的观点截然相反。单就这一点而论，莫理循的见地之深便为濮兰德所不及。对于时局认识的深度和材料掌握程度的不

同又使二者的总体判断有所不同。莫理循以为，中国的形势并非满人反对汉人，因为汉人官员占据的比重并未减少，毕竟满族所建立的汉族官僚是其继续掌权的希望所在。而既然满人的“忠诚”从未发生问题，英国是否需要积极干涉中国内政实际仍待商榷。当时，光绪皇帝遭到杀害的谣言漫天飞传，政局变动的风险促使莫理循同部分英国人一样将慈禧太后的死亡视作解决困难的良方。这一时期正在中国访问的英国海军上将查尔斯·贝尔福勋爵在参观袁世凯驻扎在天津城外的军营后，提议袁世凯通过暴力手段威胁慈禧太后在退位诏书上签字。英国政府对这一想法不屑一顾，“对英国来说，任何撇开中国人民和欧洲列强接管中国政府的企图都万行不通”（彼得·汤普森、罗伯特·麦克林：《中国的莫理循》，莫理循的立场亦如是）。

不难看出，莫理循对中国局势颇具洞见，他兼具超于当事者的清醒与高于一般民众的敏锐，从其对中国内政民情的了解来看，“中国的莫理循”之称可谓得当。然而，莫理循仍是以一个大英帝国臣民的身份来关注和同情中国的，他的着眼点不仅在于民生疾苦或是变革的力量，更在于它们对英国的影响。与其说他热爱中国，不如说他忠诚于大英帝国，因此他忠诚于大英帝国，并将尽力将在中国的使命完成到最优，这种立场不可避免地影响他的判断。例如，莫理循长期以来轻视和排斥孙中山，将维持英方地位和实现中国变革的筹码押在袁世凯身上，这既是其遭人诟病的原因之一，亦是

他自己所后悔惋惜之处。莫理循曾坦言，若早些接触和了解孙中山，中国的发展或许大有不同。当然，莫理循本人的影响之大也从中可以一见。

时隔百年，或许很难揣测一位澳大利亚人来到中国、在北京居住二十余年、与中国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往来应酬的动机——单纯的热爱中国或是为国效力抑或作为记者的本分都很难完全解释。当他以《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进行报道时，对信息的搜集和分析都关乎大英帝国在远东的政策调整，例如著名的日俄战争由于他在其中产生的重要影响又称“莫理循战争”。而当莫理循成为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时，他更是对中英政策的制定产生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澳大利亚学者骆惠敏得出结论：莫理循的中国是按照英国规定的模式发展的、“列强觊觎和剥削”的中国，莫理循既是帝国主义的辩护士，又拥护中国当局。对他来说，“从《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这一职位跳到袁世凯总统的政治顾问的这一职位，是一条笔直的道路”。（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卷）笔者以为，虽然莫理循具有使中国按照英国规定模式发展的意愿，但他对国情民生亦非全然不顾。如其信中所言：“我和其他人一样赞成变法维新。当我想到中国大众的时候，我心目中所指的毋宁是内地的千百万大众，并非受到外国影响而处境有所改善的那成千上万沿海居民。”（骆惠敏编：《清末民初



坐着为莫理循

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卷）

此外，他以亲历者的身份向西方世界客观公正地报道中国的义和团运动，使得妖魔化中国的舆论有所缓和；而他作为记者的报道和作为顾问的提议，也最大可能地考虑到中国的利益，至少莫理循本人这么认为。

莫理循究竟只是一个在中国的澳大利亚人还是“中国的莫理循”似乎很难断言，他无疑是了解中国局势的。但这种了解是否是真正的理解？作为大英帝国的臣民，莫理循对中国的局势的把握也许仅是一个旁观者的通透；或者，生长在澳大利亚、接受着大英帝国的价值观念成长的莫理循，竟比无数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比许多生在中国又喝过洋墨水的中国人更了解中国？

且不论莫理循对时局究竟有什么样的作用，即使他不曾有意干涉政局，作为一名记者、

# 熙宁三年王安石与司马光往来信件所见二人的君子之交

北宋熙宁三年三月三日，时任参知政事王安石收到了一封来自御史中丞司马光的信，这是他第二次收到这位政敌的信了。虽然此封信比第一封的字数少了很多，但言辞仍旧很重。介甫“大慚欲怒”（《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然而还是给他写了封简练犀利的答信，这就是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之后，君实又不厌其烦地回了介甫第三封信。二人这来来去去的四封信不出所料都是以王安石所领导的熙宁变法作为核心议题的，虽然二人还维持着儒者交往互相尊敬的态度，但字里行间仍透出浓浓的火药味。这四封信是熙宁变法间变法派和守旧派最重要政治人物之间交往的珍贵史料，通过分析，我们不能得到有关变法的情况，还能得出二位先生个人品格与私人关系的一些信息。

君实给介甫的第一封信《与王介甫书》，落款于熙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在这封接近四千字的长信中，司马光一上来便采用了自谦的态度，将王安石抬得很高，不过，这番话

是为后文述说“人人归咎于介甫”的现状做铺垫，进而引出对介甫“用心太过，自信太厚”的批评。接着，他分别对王安石“置三司条例司”的“侵官”、“不次用人的”“骚扰百姓”、“置提举常平广惠仓……先散青苗钱，次欲使比户出助役钱，次又欲更搜求农田水利而行之”的“敛民钱”予以批驳，直言这些事“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独以为可，非介甫之智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这是他所谓介甫的“用心太过”。对于“自信太厚”，君实认为这主要表现为介甫“骄亢自用，不受忠谏”，使“方正曰疏，谄谀日亲”，并连用八典揭示拒谏的危害。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腴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引《临川集》）王安石的这封回信历来被视为驳论文的经典，短小精悍却力有千钧，体现了王安石的刚直性格与坚持变法毫不动摇的决心。司马光收信后也针对王安石的四条驳论——进行了再度反驳，这便有了《与王介甫第三书》，信中对于介甫的回信君实直言“不胜感谢”。（《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引《传家集》）

这几封信不仅反映了二人在变法过程中的争论之激烈，于字里行间中更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两位先生的君子品格。司马光在第一封信中的开头便引用了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王安石与司马光无论是家庭背

景还是仕途经历都不尽相同，在熙宁变法期间更是因为代表着两大相互对立的政治阵营而被千百年的人们所铭记。他们一个务求变通且雷厉风行，一个恪守祖制而反对操之过急；一个言“开源”，一个倡“节流”。但出于古代儒家士大夫之兼济天下的宏愿，他们根本的目的都是为了大宋江山永固、生民安居乐业，而非将自身的政见和成果作为自己向权力高攀的垫脚石。从现代人的解译来说，介甫与君实都是性格极其实直不阿的人，前者被称为“拗相公”，后者也有“司马牛”之诨名。像君实形容介甫“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的样子自己又何尝没有做过，“元祐更化”时向全国发布废除新法命令的他是多么果决。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妥协，也没有为了政治前途而曲意附和。

虽然他们对各自观点的坚持是那么坚定，对对方观点的批驳是那么尖锐，对对方及其“党羽”的贬斥是那么不留情面，但二人在变法过程中始终没有恶意攻击对方品格。著名的“迩英殿奏对”中，二人无不就事论事，从此信中亦可看出他们在变法初期还不厌其烦地以朋友的身份劝谏对方，希望对方放弃自己“错误”的政见，握手言和。他们在熙宁变法时期的唇枪舌剑恰恰大多针对对方阵营中闻风而动、借机攀附的政治投机者，介甫所言“流俗之人”和君实口中的“陷

谀之人”俱是。介甫和君实认为，那种以逢迎附会新旧二党的见解而得以见用，实则表里不一的官员们比自己在政治上真正的对手更可怕和可耻。可以说，他们出于士大夫的责任感和对当时社会的理解，以自己无比真切炽热的情感在庙堂之上战斗，没有丝毫杂念之心。

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可能就在于对自己初心和信仰的坚守。变法中多少政治投机者丢失了初心和信仰，正是王安石和司马光最宝贵的品格，二人真乃君子也！

当然，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政敌关系无疑，君实信中的一句“光不才，不足以辱介甫为友”即是明证。但是，二者俱是君子，不管观点多么相左，争吵多么激烈，他们一定惺惺相惜的，有着“君子之神交”。

（《宋人轶事汇编》）而在王安石谢世江宁后，面对斗了近二十年的政治对手，司马光说了这么一句话：“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远，才俊辐凑，败坏百度，以致于今。此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覆之徒，必识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皇宋通鉴》



王安石

长编纪事本末》）他对介甫的评价十分中肯又无任何私人之偏见，并向朝廷祈厚葬之礼。

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可能就在于对自己初心和信仰的坚守。变法中多少政治投机者丢失了初心和信仰，正是王安石和司马光去世后的元祐党人，以及“新党”后面的章惇、蔡京等肆虐无忌惮地打击异己和相互倾轧的现象才与王安石、司马光之间的冲突大不相同，而是权力和意气之争，且不说元祐党人后来终亦分裂。

介甫在给君实唯一的那封回信中指出，“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这句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二人的争斗原因。而历史上的名实之争，本质上就是当社会历史发生变化是旧有事物的概念是否符合新实际需要的问题。大宋百年的祖宗之法，究竟是守成，还是革新？面对着这个问题，王安石和司马光给统治者交出了两份都经过深思熟虑但截然不同的答卷。一方面，他们在余生中君子般地坚守着自己的答案；另一方面，他们之间有限的争斗和交往，也都保持了君子的姿态。无论是介甫还是君实，都保有着一颗光明磊落的君子之初心。

撰稿 / 本报记者 程明杰

（图片来自网络）







1971年6月的一天，他来参加他的葬礼。他是近花甲的启功，而遗照上的他，是年逾耄耋的陈垣校长。他本想为他献一束花的，可是却被拦在门外，老人站在门外远远地看着门内照片上的老人，他深深地向他鞠了一个躬，这个躬，他38年前也曾向他鞠过。

启功出生于1912年，中国告别帝制步入共和的那一年。他是皇室后裔，出生时早已家道中落，一贫如洗。命运弄人，他1岁丧父，10岁时又失去曾祖父、祖父，家里负债累累，衣食不给。在曾祖父门生的帮助下，他才勉强入校学习，但后来由于英语成绩太差，中学没读完就被迫辍学。在往后的一段岁月里，启功拜画家贾羲民为师，学习书画鉴赏。经贾老师的介绍，启功又转投名画家吴镜汀门下，学习“内行画”。最后师从溥心畲和齐白石，在校外完成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学业。

启功二十岁时，书画文章都已颇见功力，小有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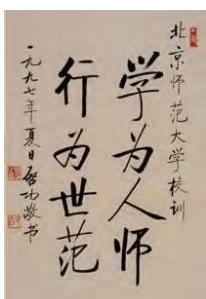
气。祖父的门生傅增湘拿着启功的作品，找到了辅仁大学的校长陈垣，意在给他找一点谋生的机会。傅老先生回来告诉启功说：“援庵说你写得不错，他的印象不错，可以见他。无论能否得到工作安排，你总要勤向陈先生请教，学到做学问的门径，这比得到一个职业还重要，一生受用不尽。”（启功：《陈垣先生教我读书》）后来启功回忆说，初见陈垣先生，眉眼眼角肃穆威严，未免有些害怕。但他开口说：“我的叔叔陈简墀和你父亲是同年翰林，我们还是世交呢！”（启功：《陈垣先生教我读书》）其实陈先生早就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对于封建的科举关系焉能那样讲求？但自从听了这句话，启功和先生之间，像是拆了一堵生疏的墙壁。之后不久，启功便被推荐去辅仁大学附属中学教一班“国文”。家境贫寒的启功，特别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可是，没干多分，分管附中的一位院长以启功“中学还未毕业就教中学不合制度”为由，将他辞退了。陈垣很关心地对启功说：“既然中学教师当不成，也不要灰心，只要努力，今后出路一定会有。”（陈鲁民：《启功与恩师陈垣》）

在失业的这两年里，启功生活十分清贫，只能靠卖画勉强维持生计。而陈垣了解启功的才华，不希望他就

此被埋没，于是又推荐他去辅仁大学教大一年级的国文。在此之间，陈垣更是将自己教书多年的实践经验总结为“九条须知”，传授给启功，使其受益终生。但不幸的是，在担任辅仁大学国文老师不久，启功又同样因为文凭的问题被解雇，这一次他痛定思痛，苦读苦研，用水平和实力来弥补文凭的短板。月薪尝胆苦学了两年多后，1938年秋季开学时，陈垣再一次雪中送炭，介绍他到辅仁大学任国文系讲师，专门讲授大学的普通国文课。这次，启功才算真正站稳了讲台，一干就是一辈子。在任教期间，陈垣对启功的鼓励从未停止。辅仁大学有一位教授英千里，在抗战胜利后出任北平市的教育局长，从辅仁的老师中找人，想让启功去管一个室。为此，启功向陈垣先生请教。陈垣先生问：“你自己觉得怎么样？”启功说：“我少无宦情。”先生听了哈哈大笑：“既然你无宦情，我可以告诉你学校送给你的聘书，你是老师，是宾客；衙门发给你的委任状，你是委员，是官员。”（刘宜庆：《浪淘尽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启功明白了，立刻告辞回家，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英千里对他的重视，又婉言拒绝了他的好意。启功拿着这封信去请陈垣先生过目。恰好陈垣刚买了一开章学诚的手

札，搁在柜里，挂在墙上。老师亡灵。在陈垣诞辰120周年之际，启功将自己毕生画作义卖所得的120万，全部捐贈给北京师范大学成立奖学助学金，并拒绝了校方所提出的以“启功奖学金”来命名的建议，而是以陈垣老校长的励耘书屋的“励耘”二字为名，成立了“北京师范大学励耘奖学助学基金”，以报师恩。

所谓知己，便是知情、知意、知心；如何做知己，便是通情、达意、交心。雪中送炭，既救急又温暖，困惑得解，既通达又激励。人有知己，就能过大关。回顾陈垣与启功四十年来的师生关系，正如启功所说的那样，



师大校训

师生之情，有逾父子。陈垣于启功，不仅是施教之恩，更是知遇之恩。因为懂得，所以能够知情、知意、知心；因为陪伴，所以能够通情、达意、交心。

漫步于今日的师大校园中，依旧能看到陈垣校长的雕像，他站姿笔挺，双手交叉放在身前，温和的目光望向远方，在他的注视下，一代又一代的师大学子从这里走出，教书育人，诲人不倦，提携后进，正如北师大校训所道：“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所学要为世人之师，所行应为世人之范。师大学子，正在践行着作为师大人的责任，一行一止之间，迈出的是师大的良好风范，一举一动之间，挥洒出的更是今日师大桃李争妍的气魄。

撰稿 / 本报记者 冯若男

## (上接第七版)

摇滚乐现状，我们所能看到的景象，绝非失败主义的悲观图景，而是希望尚存的小团圆结局。红磡之后，一定还有“红磡”，也许地点不在香港，或许表演者全然不同，但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一定再有一场无比成功的演唱会，延续着中国摇滚乐的精彩和盛名。

救命稻草同样是不断富强繁荣的社会。音乐软件可观的下载量和流量、逐渐趋于饱和的音乐市场照应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壮语，巨大的人口基数又使得常见的各类音乐都能够在中国大陆找到对应的受众。中国摇滚乐也许不是当代中国音乐花园里开得最鲜艳夺目的一朵花，但无疑的开得最早而不曾凋零风骨犹存的一株。在流行与大众的冲击下，“全民摇滚”的年代不复存在，但这大抵只是稀释作用而非堤坝垮塌。执着于摇滚的老炮儿，逐渐着迷的新入在数量上并不会比黄金年代少，更上一个层次优渥的生活甚至会让更多人玩起了摇滚，他们只是冲散在人群，失去了旧有的绝对话语权罢了。每年迷笛音乐节和草莓音乐节的感召或可为此说提供支撑。另外，摇滚受众数目的增加也使音乐公司看到了商机，同时文化市场也趋于规范化，中国摇滚乐大的发展环境是向好的。而对于摇滚文化中反叛精神和批判态度，中国摇滚人则以哲性语言或情绪化表达进行中和，使其能够得以呈现，万能青年旅店、后海大鲨鱼、麻园诗人等组合便是其中的佼佼者。最后，中国摇滚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呈现着与其他音乐风格融合的状态。如布衣乐队和低苦艾乐队多以民谣乐人的身份

为人所熟知。更优的环境、更多的受众、更广的风格，这些赋予了中国摇滚新的生命力，使我们看到一个缓慢而健康生长的摇滚生态，也让我们有理由去期待下一场激动人心的红磡盛典。

不可否认，国人中对于摇滚乐仍然有“摇滚就是重金属”、“摇滚是消极颓废的”等透着标签色彩的偏见存在，但只要熟悉并了解中国摇滚，这些误解便会自行烟消云散。同时，随着中国摇滚乐自身地位的巩固，思维惯性产生的误解，也必将逐渐消减。

从八十年代到今天，中国摇滚已经有将近四十年的时间了，我们看到它在黄金时期的飞速发展后盛极而衰，由此背景可知一定会有有一场最后的晚餐般的音乐会。历史选择了94年的香港红磡体育馆。而在当今，中国摇滚乐地位逐渐巩固，产生新的变化之后，我们有理由去相信，一定还有会有一次“红磡”。

2018年2月1日晚九点，北京，五道营胡同。一家现

场酒吧内，一场属于三支校

园乐队的演出准时开始。台

下的观众不很多，却刚好站

满了只比舞台低一个台阶的

平台。

撰稿 / 本报记者 刘锐

# 倾之以心 载之以文

撰稿 / 本报记者 刘锐

今年元旦前夕，微信上出现过一场“晒十八岁照片”集体怀旧运动。对于90后而言，还未来自得及轰轰烈烈，青春就这样悄然而逝，一去不返。在这样一股风潮下，各路媒体伺机而动，纷纷以此为噱头，扩大宣传。新京报书评周刊微信公众号在文章中这样评论道：“青春是敏锐的，是思考的，也是多愁善感的。花一样的年纪对生活环境的改变，极为敏感，而记忆或许也最为深刻。”恰如其分地表达了90后的心声，引来大量网友的分享与留言，获得了较为可观的阅读量。分享者中，或许也有你的身影吧。不知不觉间，新媒体就这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闯入我们的生活。

不知从何时起，人们愈来愈不愿静下来心来细细品味纸质的书本，而是更加青睐于网络上短小精悍的文章或图片，这似乎成为每个媒体人的共识。于是，越来越多的主流媒体，纷纷投入到融合媒体的传播大军中，新媒体平台更是如此。目前我国使用最为广泛的新媒体莫

过于微博和微信，为了进一步保障社会稳定，并让更多的民众了解新媒体、深入新媒体，近几年，我国各地的传统媒体机构，如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相继开通自己的官方微博账号、微信公众号。为的就是能够第一时间传播信息，让更多的受众尽快获得自己想要的信息。



春秋人文报

读到这样一句话“不过是一块补丁而已，既不翻新，亦难遮羞。”被它自我解嘲式的语言吸引，开始翻看“思维补丁”之前推出的文章，虽然文章的形式不够华丽精致，但胜在内容有深度，能够引发读者的思考，从而保持稳定的阅读量。



思维补丁

顺应时代潮流，春秋人文报也开通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旨在“继春秋之文学，扬人文之精神”，为受众带来具有历史精神和情怀的文章。这背后，凝聚着每一位新媒体人的辛劳付出与努力。首先，一篇优秀的文章必须建立在新颖别致的选题的基础上。对于春秋人文报而言，选题的基本准则就在于以历史人文为基本出发点，结合当下热议话题，追本溯源，探求历史典故和历史风俗。待选题确定后，最重要的是文章内容，既要用轻松活泼的语言来引入，又需要有严谨的学术内容来支撑，两者交互融合，形成了人文报特有的行文风格。然后，经过反复雕琢，形成成品。当然，作为初出茅庐者，在学术性上，不及一些有资深学者坐镇的微信公众号，如章黄国学；在影响力上，不如蛋蛋网这样的校园网站。但我们凭借自身特色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比较成功的案例是《想抽SSR？也许你知道水平还不够……》，这篇文章结合当时火爆朋友圈的“阴阳师”网络游戏，探讨阴阳师的起源、神话传说等，获得了不错的反响。

然而，新媒体的发展良莠不齐，有的不经求证，胡言乱语，纯粹依靠雷人的标题博人眼球，更有甚者，为了获得更多的阅读量，不惜夸大事实，误导不知所以的受众。我们虽无法阻挡新媒体商业化的趋势，但作为校园媒体，春秋人文报在校园文化宣传上不断进行新的尝试，但始终不变的是赤诚之心。每一篇文章都倾注了我们的心血，体现着我们对于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的思考，力求做到严谨可信。



平安时代是一个高丽外表文治和平、而内部充满斗争的贵族与权力斗争的时代。由于公卿贵族的失职，造成了人民生活的困苦。在这种种恶化的环境下，庶民对公卿产生了“为什么公卿们这么坏”的不满。而公卿们却认为“庶民也有尊卑贵贱之分，而且不能乱来”。平安时代日本京都造就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兴衰。大地震、大火、饥荒等灾害不断袭来，因此人心惶惶，鬼神之乱甚嚣尘上。不仅社会治安之萧条，连百姓间也流行起来。愚昧的庶民们日夜祈祷鬼神的保佑，日复一日的诅咒之说。

春秋人文报推送

时代虽然变了，但作为文化传播者，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所不变的是“吾手写吾心”的初衷，传播正能量的社会责任感，这是每个媒体人所应有的文化良心。而传播校园文化的春秋人文报，更应该保持这份纯粹，向大众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撰稿 / 本报记者 高婷  
(图片均来自互联网)